篆刻家的『刀下工笔』



“汉柏秦松气概　商鼎夏彝精神”



“大树画馆”



“千秋笔墨惊天地　万里云山寄画图”



“尽美固可扬　片善亦不遏”

李广华

甬上金石篆刻，自古名家辈出。

西泠印社是展示篆刻最有影响力的平台。在几次篆刻评选中，作为评委，甬上篆刻名家施晓峰目光专注地审阅着眼前摆放的每一份印作。这些篆刻作品，都经过精心巧妙的构思、殚精竭虑的打磨创作。能入评委法眼的，无疑是创作者花费心思、自觉得意之作，无论是发端于秦汉的刀法还是明清印风，朱文抑或白文，在施晓峰看来，均好似重现着自己当年探索所走过的路，感同身受，因此，手中的“票”沉甸甸的。

一个午后，当暖阳斜射到宁波和丰创意广场茶座的椅子上时，光线柔和，温暖如春。戴上老花镜，施晓峰从包中取出一枚青田封门青小印，随手在桌子上垫了几层雪白的餐巾纸，在这温暖的阳光下刻起了小印章的边款。单刀入石，力度随着笔画而变化，如犁地般，只听得刀与石碰撞发出轻微的“咔咔”声响。每刻两刀，他会用手指抹去刀尖“犁”出的石粉，随之，印面上出现白色清晰的字迹。刻刀在印石上舞动，一枚枚精品印章相继诞生。像这样凝神专注投入创作，已历40多个春秋，只不过多数时候是在他的静庐书斋里完成。



施晓峰在创作中

1

宁波是“篆刻重镇”，在这片土地上，篆刻有着特殊的含义。在西泠印社创立120多年的时间里，宁波籍社员有近40位；屈指可数的几任社长中，就有宁波人马衡和沙孟海；副社长则有潘天寿、陈振濂、童衍方、孙慰祖，以及名誉副社长高式熊。正因有着肥沃的艺术土壤，甬籍篆刻家才在西泠印社的大家庭中，人数众多，出类拔萃，各领风骚。而这耀眼的金石光芒背后，是一代代篆刻人的不懈探索。

施晓峰，1959年生于宁波，幼时曾居住在永寿巷的老屋，与高式熊、赵叔孺故居隔街相望。曾祖父与钱业大亨秦润卿是故交，故祖父曾拜秦润卿为师，同时也在旅沪宁波同乡会中兼职。祖母出身于宁波城西高桥镇的何氏望族。20世纪30年代初，祖父曾租住于上海山西北路吉庆里吴东迈先生的寓所，二楼对门住的是篆刻家王个簃先生，祖父与这些文人多有接触往来。去世前，祖父特意将晓峰叫到床前，亲手将几把海上名人的折扇交给他，叮嘱要妥善收藏。

晓峰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宁波度过的，可每到寒暑假，上海外滩边的九江路、黄陂路上的美术馆、福州路上的书店、充满市井气的石库门弄堂、法国梧桐树下的复兴路……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。上海滩的洋房、街道与人们的穿着、举止，以及人文风情、艺术风格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，伴他成长。那里还有数不尽的艺术名家和他喜欢的艺术环境，“海派文化”“海派生活”像种子一样，深深地植入他的脑海。他为人谦虚低调、善良宽厚，谈吐优雅，穿搭简约，极具“腔调”。

命运对每个人的“光顾”，千差万别，有的人一生顺遂，如愿地踏上自己的生活之路；有的人则注定要为之钻研奋斗，不下一番功夫，无法达到灵魂的彼岸。

晓峰18岁参加工作，工余，他很少参与工友们的闲聊、打牌，而是悄悄地躲在角落里读自己喜欢的书，专业的、艺术的、哲思的，均有涉猎。几年下来，他从学徒成长为技术能手，艺术修养也得到提升。后来，他得偿所愿进入宁波地区工艺美术公司从事设计工作，所学知识有了用武之地。再后来，又到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学校工作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百业待兴，人们的求知欲望甚是浓厚，晓峰也不例外。他一边工作，一边为自己充电，参加了甬江业余学校国画班的学习，宁波艺术界的名家刘文选、沈元发、陆天波等为他们授课。同时，他拜沪上著名书画收藏家金元章先生为师，让自己的“刀笔”实践与海派艺术有了良好的对接。

2

1989年，宁波篆刻委员会成立。与各方的联络是一项需要耐心细心的活儿，晓峰脚踏自行车，穿行于大街小巷，拜访名家，征集作品。篆刻委员会成立之初，甬上名家曹厚德先生出任主任，晓峰担任秘书长。经过一段时间筹划，“首届宁波篆刻邀请展”终于亮相。这次展览是作为“篆刻重镇”的宁波首次举办大规模的篆刻专项展览，沙孟海、高式熊、余正、陈振濂、童衍方等身处沪杭的甬籍篆刻名家均提供了参展作品。沙孟海还应曹厚德之邀，题写了“宁波印社”四个大字。如今，月湖景区蒋宅内所挂的“宁波印社”牌匾，便是那次题写的。

36岁时，晓峰迎来艺术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。1995年，中央电视台举办第三届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赛，启功、沈鹏、欧阳中石等名家担任评委。央视的影响力毋庸置疑，大赛共收到全国七万余名书法篆刻爱好者的十余万件作品。

按照比赛要求，每位参赛者须创作一组对应央视栏目名称的作品，晓峰刻的是“与你同行”“综艺大观”“书坛画苑”三组。初选，七万余人“挤天梯”，经层层筛选，有九人的作品入围一等奖候选，其中八人的是书法作品，篆刻作品只留下晓峰的。

决赛的方式更特别，入围者须到电视台现场创作。这是大赛为考验选手现场创作能力、防止修改和加工而采取的方式。创作内容以抽签方式决定，限时一小时。最终，晓峰获得一等奖。

晓峰拿了央视大奖，在业内引发不小轰动。戴着遮阳帽、穿着休闲装的他，在获奖者中显得年轻且有活力。在收到各种祝贺的同时，他的事迹也被各路媒体纷纷报道。而低调的他却显得很冷静，把获奖看作一次“很不错的”起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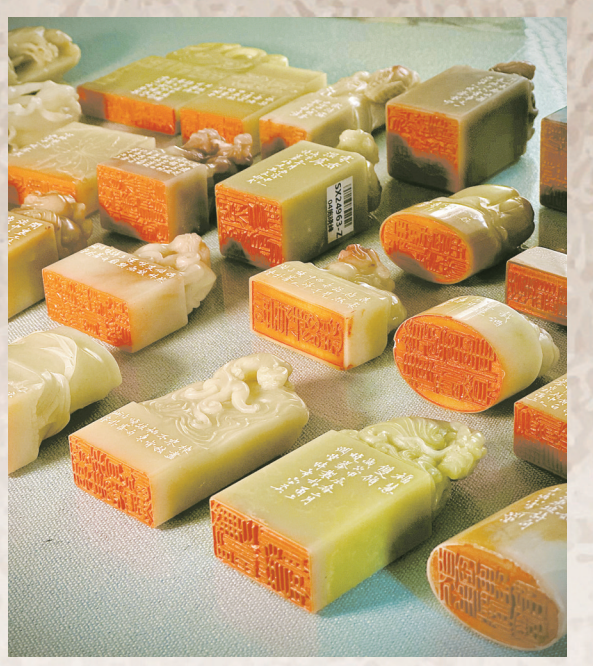
2000年，德国汉诺威世界博览会举行，各国均组织了各具特色的本土文化代表团前往参展。晓峰有幸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，向世界展示篆刻这一独特的东方艺术，诠释中国印的文化内涵。他还抽时间深入汉诺威的街巷，了解德国文化和习俗。

博览会搞得热热闹闹，参观者络绎不绝。一天傍晚，晓峰突然接到通知，要他刻一枚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名印，作为前来考察博览会的朱镕基总理的外事赠礼。

看似小小的一枚印章，却是一份厚重的“国礼”。晓峰内心既激动，又觉责任重大。

汉诺威的夜，深沉而宁静，他坐在书桌前，进入创作状态，巧思布局，反复修改。他想：布局要大方，行刀要利落，尽展篆刻的意趣、中国文化的味道。考虑成熟后，他大胆奏刀，一气呵成，拿出了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。

第二天，朱镕基在施罗德的陪同下，来到中国馆视察，在愉快的气氛中，朱镕基赠送了这枚用东方艺术形式表达友好的“印信”。施罗德拿到印章，感到十分新奇，一脸的笑容。一旁的晓峰也会心地笑了。



静庐作品

3

经千余年发展，篆刻艺坛早已形成众多流派。作为以刀为笔、以石为纸的印人，要在名家汇集的印坛站稳脚跟，提高自身造诣是首要之务，而形成自身独有风格，练就过人的看家本领，更是必不可少。

晓峰拿手的是“圆朱文印”。

这是宋元以降文人篆刻兴起后，随着审美需求的进一步提升，在篆刻领域细化形成的以典雅唯美为特征的一种艺术形式，是印坛的“宋元绘画”。20世纪20年代后，以赵叔孺、王福庵、陈巨来为代表的篆刻家推崇圆朱文印，师古不泥，为印坛带来一股清风。

后来，圆朱文印受到重写意、重表现等印风影响，一度迷失了路径，步入低谷。而习自秦汉的晓峰，内心却有本经，他执着地认为，圆朱文印美在恬静、雍容、飘逸、散淡，其最高境界是追求静美、古雅的气韵。

任各类印风劲刮，他执着于圆朱文印，不为所动，一“刻”便是几十年。最终成为这一篆刻风格阵营中的佼佼者，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，在西泠印社及甬上均有了自己的位置。

圆朱文印看似秀雅，笔画单一，可顺畅的线条里透着治印者的扎实功底。有人问，治圆朱文印是否需要修饰？晓峰坦言：治印需要修饰，看似简单的调整，实乃画龙点睛的过程。

晓峰的印与他本人一样，表现出明显的“文人气”，像“古琴弹夜月，淡墨画秋山”“满室书画洗心尘”等印，典雅大气，古穆敦厚，布局错落有致，结字得体，线条圆润有力，曾被多家专业期刊选用。他的许多作品已被博物馆、美术馆等机构及个人收藏。



静庐书房一角

4

在晓峰的相册里，有张照片，让人忍俊不禁：甬籍著名篆刻家高式熊先生被围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只露出头部，后面站立的是晓峰，正神情专注地为高老理发。街头或理发店里才能见到的这一幕，定格了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和西泠印社社员的情谊。一老一少，一前一后，一站一立，他们的“人间烟火”仿佛早已跳出了篆刻圈，融入了日常生活。高老的头发稀疏，理发难度较大，恰巧遇到了会理发的同行晚辈。晓峰说：“高老来宁波，我常给他理发。”

“我不仅喜欢理发，平时也喜欢烧菜，还喜欢平面空间设计、摄影、收藏，尤其热衷于逛街。”他践行着“艺术生活化、生活艺术化”的理念。的确，走进他的静庐书房，艺术氛围扑面而来，给人的感觉是设计精心，清新雅致，品位十足。所挂山水画，画幅不大，除了惯常的水墨外，还运用了青绿色彩，别致出新，在整个书房氛围营造中可谓“四两拨千斤”，煞是显眼，增添了不少艺术趣味。桌案上的几盆菖蒲清雅灵动，配以幽兰、赏石等，给人一种室雅艺高的空间感。

位于甬江岸边和丰创意广场内的施晓峰工作室，更是他精心设计的另一处艺术空间。工作室分成两个区域：一个是创作交流的场所，有平台，有作品展示，尽显格调；另一个是名家作品展览区，有余秋雨、冯骥才、高式熊、徐建融、吴永良、李刚田等名家作品，尽显品格。参观者既可以将其视作创作交流之所，又可当作一座小型的艺术博物馆。

如今的艺术圈良莠不齐，有人为艺术而艺术，有人追名逐利，把功夫用到了艺术之外，而晓峰却踏踏实实地创作，追求艺术化生存。“意飘云物外，诗入画图中”，本是指画家用笔说话，而晓峰在用印刀表情达意。

他曾感慨：“多年以来，我乐此不疲地在刀与石的缝隙中，寻找那种细微的快感，陶醉在恬静、飘逸、散淡之中。”社会上的许多展览或活动邀请，都被他婉言谢绝。他说，要保持独立的思考，尽可能不被外界干扰。

余秋雨在《施晓峰篆刻选》序言中写道：“我相信，这种审美境界，也正是明清以来绝大多数印人的追求。印人手上握刀，但他们的每一刀下去都不具有争辩性、尖刻性和排他性，只在小小的空间中营造一种平静的温暖，为自己，也为别人。”

锐观察

副刊，在新的崛起面前

方麒君

我们看到，纸媒正在悄悄自我革新。《广西日报》将反映菲尔兹奖得主王虹成长经历的文章《王的猜想》放在第一版，引发“洛阳纸贵”式的热销现象。此文容易令人联想到徐迟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而《哥德巴赫猜想》首发于《人民文学》杂志，如发在报纸上，通常就是副刊作品。如果按照传统的版面安排，《王的猜想》一般不会被放在第一版。但它就是被放在了第一版，且大获成功。因此，今后副刊作品“喧宾夺主”或许会成为常态，正刊能做到的，副刊同样能做到，甚至更丰富多样，更灵活有力。

在算力时代，在AI时代，书写方式、传播方式甚至思考方式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。纸媒的新的崛起，是存在可能的，刊有《王的猜想》的那期《广西日报》启动加印，形成纸媒与受众的双向奔赴，就是一个明证。而纸媒要实现新的崛起，或许要先从副刊的新的崛起“破题”。

第一，副刊可以吹响号角。正刊常表现为定调子、标风向，但回望曾经的岁月，不难发现副刊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，且更具人文性。1980年5月7日，《光明日报》第四版发表谢冕的文章《在新的崛起面前》，主张对朦胧诗要听听、看看、想想，要适当地容忍。当时的《光明日报》一期大多四个版面，再从文章属性判断，这个第四版当是副刊了。《在新的崛起面前》对新生事物抒发欢迎与赞叹之情，比新闻报道更有温暖感与厚重感、感染力与说服力，它展现了诗歌创作的崭新风貌，彰显着社会的多元视角与认知。

其实，今年9月14日《人民日报》副刊“大地”刊发王蒙的文章《办气韵生动的副刊》，本身就是“号角”。一“文”激起千层浪，由此激发的关于副刊的讨论可谓达到“现象级”规模。当然，在其他领域，副刊也可发挥“号角”作用。比如，副刊上刊发的带着作者切身感受的关于机动车禁鸣、酒后不开车等散文、小小说，与宣传标语相比，能引发更多“同频共振”，更好地传递正能量、涵养真善美。

第二，副刊可以为时代留痕。我常将地方纸媒比作一座城市或一个地区的“日记”，积累起来形成的“档案”于后世无疑就是“历史”。新闻正刊通常可以理解为“政治史”“社会史”，而副刊则是带着体温的“生活史”。如果没有唐诗，仅凭史官记录，我们对唐代的理解肯定会平面、单薄得多，而有了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等人的浩大诗行，后世对唐代的感知就会立体、细腻许多。盛唐的万家灯火、欢声笑语，晚唐的刀光剑影、饿殍残垣，通过带着或醉意或痛感的文字，隔着千年时光如此真切地呈现在我们眼前。

由此我想到，副刊里的文章，无论是名家闲笔，还是素人力作，这些千字文里有柴米油盐的烟火气，有山川晨昏的真性情，其实也积淀、铸就了一部漫长而鲜活的“当代生活史”，告诉千百年后的人们，曾经的生活是这样的。一个时代的面貌到底是怎样的？或许在副刊上可以表达更多，也可以读懂更多。

第三，副刊可以形成品牌引领。眼下，不只是人人拥有“一个麦克风”，甚至可以人人拥有“一家融媒体中心”。笔者认为，报纸新闻的优势在于“白纸黑字”的权威性。那么，纸媒如何让人们持续充满热情呢？进一步做优做强副刊，形成品牌引领，是当前的必要路径。放眼全国，《人民日报》的“大地”、《新民晚报》的“夜光杯”等品牌副刊耳熟能详。

具有品牌价值的副刊背后，往往相应驻守着一位或多位心意相通的编辑。有一年，我出差富阳，行走于富春江边感慨成文。知道《富阳日报》的副刊“达夫弄一号”的编辑是著名诗人蒋立波，就将文章投去试试。不久之后，我读到了样报，版面别有气质，让我对富阳也产生了“滤镜”。一个具有品牌价值的副刊，是黏合受众的重要载体，是支撑纸媒核心竞争力的拳头产品，是扩大城市影响力的隐形利器。

第四，副刊可以雅俗共赏。副刊是雅俗共赏的交集区，阳春白雪，田畈俚曲，同版共呈，大咖与小白可能成为“版友”。多年前，我在《宁波日报》副刊读到赵柏田的随笔《大河沧桑》，大气磅礴又江水温润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在《宁波日报》副刊还常读到荣荣的诗歌，属于国内诗歌领域的头部水准作品。与他们同版的，还有许多素人作者。其实，许多人的写作，就是从报纸副刊开始的，副刊作品通俗易懂，新人由读到写，容易上手。